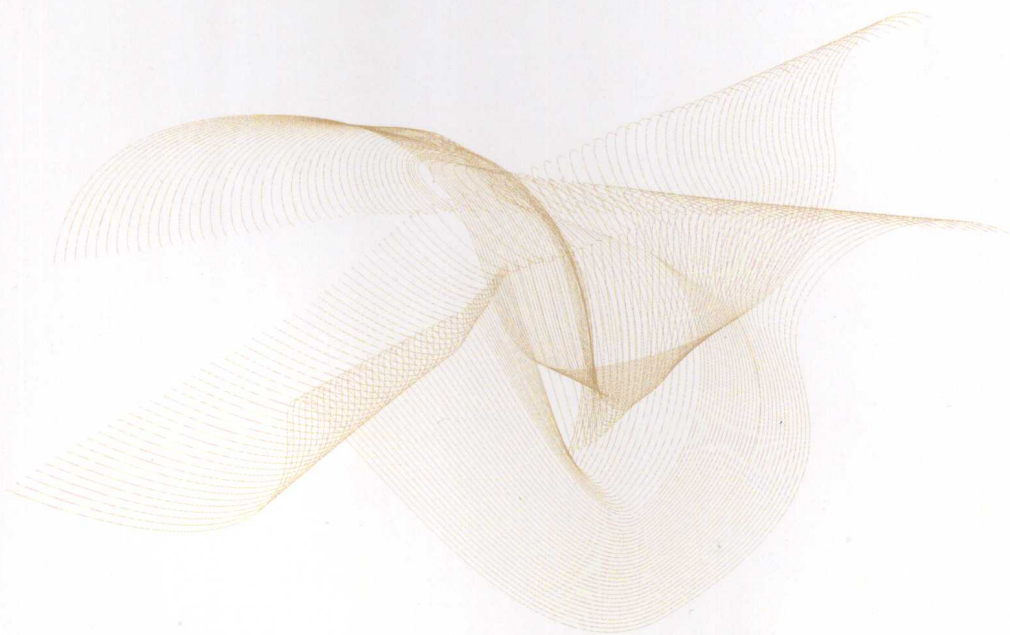


社科专著论丛

汉代学制研究

姜维公◎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汉代学制研究

姜维公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学制研究/姜维公 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8

(社科专著论丛. 第2辑)

ISBN 7-5034-1681-5

I. 汉… II. 姜… III. 学制—研究—中国—汉代
IV. G52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8375 号

责任编辑: 方正

封面设计: 张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 110113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数: 228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2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前 言	(1)
-----------	-------

一、选题的研究价值及其意义	(1)
---------------------	-------

二、学术史回顾之一——关于汉代教育制度的系统	
------------------------------	--

研究	(3)
----------	-------

三、学术史回顾之二——关于汉代教育制度的专题	
------------------------------	--

研究	(8)
----------	-------

四、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16)
--------------------	--------

第一章 汉代言学的创建与发展	(23)
----------------------	--------

第一节 太学的创建	(24)
-----------------	--------

一、太学创建的时间	(24)
-----------------	--------

二、太学创设的地点	(35)
-----------------	--------

三、太学的规模	(39)
---------------	--------

第二节 特殊学校的设立	(42)
-------------------	--------

一、四姓小侯学与宫邸学	(43)
-------------------	--------

二、鸿都门学	(45)
--------------	--------

三、东观	(53)
------------	--------

第三节 皇室教育	(55)
----------------	--------

一、对皇帝的教育	(55)
----------------	--------

二、对太子的教育	(65)
----------------	--------

三、对诸侯王的教育	(70)
第四节 地方郡县学	(73)
一、汉代地方官学的出现	(73)
二、地方官学的发展	(75)
第二章 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	(95)
第一节 先秦时期私学教育的发展概况	(95)
第二节 汉代私学的崛起与发展	(99)
一、黄老学在汉初的兴盛	(100)
二、刑名学在汉初的流行	(103)
三、其他流派在汉初的状况	(104)
四、儒学在汉代私学中的发展	(105)
第三节 书馆教育	(114)
第四节 专经教育	(117)
一、专门传授一经	(118)
二、数经兼传	(119)
三、传经兼传他术	(119)
第五节 家庭教育	(125)
一、家学传授	(125)
二、家教和家训	(131)
三、女子教育	(135)
第三章 汉代学校中的师长和学生	(149)
第一节 学校的施教人员	(149)
一、太学的施教人员	(149)
二、鸿都门学、四姓小侯等特殊学校的施教人员	(173)
三、地方官学的施教人员	(175)
四、私学的施教人员	(180)

目 录

第二节 汉代学校中的学生	(187)
一、太学生	(187)
二、鸿都门学的学生	(204)
三、四姓小侯学和宫邸学的学生	(206)
四、地方官学的学生	(206)
五、私学的学生	(210)
第四章 汉代学校的教学内容	(233)
第一节 经学是汉代教育的主要内容	(233)
第二节 官学的教学内容	(246)
一、《易》学	(247)
二、《书》学	(253)
三、《诗》学	(258)
四、《礼》学	(264)
五、《春秋》学	(269)
六、《论语》学和《孝经》学	(275)
第三节 私学的教学内容	(279)
一、书馆的教学内容	(279)
二、精舍的教学内容	(284)
第五章 汉代学校的教学形式与方法	(294)
第一节 汉代的教学组织形式	(294)
一、书本知识的传授为最基本的教学形式	(294)
二、开放式教学	(295)
三、高足弟子代师传授	(296)
四、集会	(297)
五、自学	(298)
第二节 教学方法	(299)

汉代学制研究

一、传授式	(300)
二、辩难式	(303)
三、演示式	(310)
第三节 师法与家法	(318)
一、师法、家法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	(318)
二、从师法到家法的演变	(321)
三、师法家法对汉代教育的影响	(330)
附 论 汉代教育的地域特征	(341)
第一节 汉代文化地理概述	(341)
第二节 汉代教育的地域特征	(352)
一、汉初传统的教育胜地——邹鲁、齐燕、三晋	(354)
二、中央官学的大本营——长安和洛阳	(362)
三、地方官学的典范——巴蜀	(366)
四、其他文化教育比较突出的地区	(371)
第三节 汉代游学对知识传播的作用	(375)
一、汉代游学的特征	(376)
二、游学之风兴盛的原因	(379)
三、游学活动对社会教育的影响	(382)
结 语	(392)
参考文献	(398)
后 记	(410)

前言

一、选题的研究价值及其意义

人类的教育活动是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赋予每个人以能力。教育能通过发现和提供合适的环境，鼓励人类在艺术、科学、社会和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中更加全面地发展各种能力和技巧。但是更广义地说，教育显然已被看成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发展方式。”^[1] 中国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不仅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有了较完整的教育制度，而且早已总结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我国古代教育的发达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以致几千年来我国文化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研究教育发展史通常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角度入手，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著作绝大多数是关于教育思想的研究，而对教育制度的研究不但缺乏系统性，而且非常薄弱。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作为制度研究更为强调的实证资料难以突破，这不但限制了揭示制度发展历史面貌的程度，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事实上，教育制度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可以说，某种教育思想往往通过制度化的形态才能更实际更有效地作用于教育实践，影响教育发展的进程，决定教育的成败得失。直到目前为止，有关教育制度史的学术著作屈指可数。就教育制度而言，它在汉代四百多年的时段内

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政治、文化乃至社会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所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制度史的角度看，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代学校制度的确立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学制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汉代历史的研究中学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汉代教育制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有利于推动秦汉史的深入研究。同时，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学校教育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吕思勉先生曾指出：“汉兴，除挟书之律，设学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时，益以利禄之路，于是乡学者益众，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至此全破矣。此实古今政教之一大变也。”^[2]关于汉代制度的研究，研究者从断代的角度对土地制度、官僚制度、察举制度、军事制度、仕进制度等都做过系统研究，^[3]惟独汉代教育制度的专门研究还没有人作。

其次，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汉代教育在古代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周予同先生在《中国学校制度》一书指出的那样：汉代“是中国学校制度沿革史上的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从它以后，中国学校制度的形式与内容就没有什么大的变革，一直到了满清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并且从它以后，学校制度成为选拔官僚的工具，而为统治组织的一个重要部门，也因以确定。”汉代学制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具体说来，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为后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的设立为以后历朝的官办学校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私学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人从断代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第三，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对现实生活提供借鉴与指导。作为教育的管理者或承担者，除了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和先进管理技术外，还必须以史为鉴，在继承的基础上寻求创新，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也是进一步探索、理解、改进、乃至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基本前提。正如周予同先生在《中国学校制度》中指出的那样：“对于教育倘没有历史的纵贯的观察与社会的横铺的检讨，是不配来主持实际教育事业的；因为他不流于玄想的创见，即趋于盲目的模仿。”汉代教育制度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能够为现实提供某些借鉴，从这种意义上讲，深入开展汉代教育制度的研究也是出于时代的需要。

二、学术史回顾之一——关于汉代教育制度的系统研究

关于汉代的教育制度，虽然在《史记》和《汉书》、《后汉书》的《儒林传》及《汉书·艺文志》中较系统地保存了知识阶层的文化教育活动与教材的情况，但并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制度加以记载。唐人杜佑开始关注学校制度，在《通典》中将其归入选举制度，对学校的起源、类型及入学年龄等有所讨论，并指出秦汉时期的教育与先秦时期相比明显差异在于：“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务速。”宋人王应麟和元人马端临对教育制度更加重视，将学校从选举中分离出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学校考》可以看作是古代系统研究汉代教育制度的集大成之作。马氏考证的范围很广，涉及汉代太学设置的时间与地点、博士及其弟子的选拔录用和升迁、鸿都门学乃至地方官学等等。这种考证研究不仅挖掘并保存了大量有关汉代制度史方面的资料，而且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这种系统研究起步较晚，马氏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结论都带有推测性，但这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国古代，由于教育和学术始终是政治的附庸，多数史学

家没有对教育制度予以应有的重视，因此，从总体上讲，对教育制度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19 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文化与观念的传入，特别是受到西方学术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将其作为独立的问题加以探讨。最早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郭秉文。郭氏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他通过对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的研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其论文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为名出版。该书叙述了远古至中华民国初年教育制度的发展沿革，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简史。作者在序言中阐明了该书的特点：“是书的性质乃崖略的而非特殊的，广大的而非专义的，盖兹所急需者，为吾国教育史之概要。而非专考吾国教育沿革一部分之事实故也。”因此作者在仅约 5 万字的篇幅内，详于近代以来新教育制度的发展缘起与过程，故虽名曰通史，实际上属于一种断代研究，于汉代教育制度只是蜻蜓点水式地一掠而过。尽管如此，其开拓之功不可埋没。

周予同先生的《中国学校制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系统研究汉代教育制度的力作。作者对汉代学校教育的特点、系统与种类、太学的创立与演变、太学的博士与学生、郡国学校的起源与发展、特殊学校以及学校与选举的关系等都有所论述，但正如作者所说：“在上下四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中，欲将其学校制度的演变于五六万字间详尽的表现，确为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所以本书的唯一目的，就在于给读者以一种清晰而有系统的概念，在目前能以简单的方式统御这繁复而杂乱的史料，在将来能根据这已知的迹象以求比较深邃的了解。”故该书对汉代教育制度的结论多是综述性的，其贡献在于思想方法而非研究的深入。

吕思勉先生虽然没有关于教育制度的专著问世，但是，他“很重视教育工作，同时由于已故教育家孟宪承先生的请求，作过教育史方面的研究”。^[4]先生花费极大精力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进

行披沙拣金式的钩稽，写下了大量关于汉代教育制度的读史札记，如：汉儒术盛衰、论经学今古文之别、汉兴三雍太学、私家教授之盛不始东汉、讲学者不亲授、汉世向学者多孤寒之士、游学、汉世豪杰多能读书、郡国文学、入学之年、学校由行礼变为治经、乡饮射礼等，对汉代教育制度从多种视角加以研究，这些成果在其1947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秦汉史》中有系统的表述。《秦汉史》分为上下两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按历史顺序编排；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叙述办法。作者在第十九章《秦汉学术》中分学校、文字、儒家之学、百家之学、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等八节涉及了汉代教育制度的有关问题。由于作者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所下的工夫很深，通过对史料的认真排比，发前人所未见，对马端临、赵翼等人的论断多有驳正，使汉代教育制度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成为我们今天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坚实基础。然而由于受到研究角度的限制，这种研究多少显得不够系统，特别是在运用史料方面，因先生过分重视正史材料，而忽略了简帛文书与金石记载，事实上对汉代地方教育制度的研究离开这些资料显然是不完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多种原因，不要说汉代教育制度，就连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都十分薄弱。“文革”前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著作，仅见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粉碎“四人帮”后，一批60年代初编写的教材相继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版，但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普遍存在着重视教育思想的探讨，而忽视教育制度研究的倾向。有关中国教育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一阶段教育制度研究的代表作是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年），该书是建国后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专著，作者用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将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划分为8个阶段。关于汉代的教育制度，作者从学校制度、私学、选举取士制度与学校的关系以及纸的发明与石经的创刻四个方面加以论述。该书对汉代教育制度的基本内容如官学、私学、学校教师与学生的选拔考核以及特殊学校等均有论述，并通过对教育制度本身及相关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基本勾勒出了汉代教育制度发展演变的概貌。由于这部书的编写主要是为了应中国教育史教学之需，因此，除体例较新外，对于很多问题的研究都带有总结性，而作者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部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痕迹，如编著者虽然明确规定该书的“内容范围，仅限于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但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唯物史观，将“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造纸和石刻等也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全书最明显的特点是阶级斗争观点的扩大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然而与中国教育思想史相比，虽然出版了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王铁著《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郭齐家著《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和《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等著作，但是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整体上依然十分薄弱且缺乏系统性。“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制度研究更为强调的实证资料难以突破，无疑限制了制度史研究揭示制度历史面貌的程度，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另一方面，如何切入制度史的研究以将其推向深入，这一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5] 在这些著作中，由李国均、王炳照担任主编、由俞启定、施克灿共同完成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先秦、秦汉卷》，无疑是关于汉代教育制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汉代

的文教政策、学校教育制度、私学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选举考试制度等，对汉代教育制度的研究几无遗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该书不仅扩大了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而且推动了汉代教育制度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然而，这部著作也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由于作者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者，受专业的限制，比较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与研究，而忽视了对制度本身发展的整体把握；其次，受国外及先前国内教育史研究影响较深，重视理论的探讨和体系的构建，以致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又不够深入，武断之处时有出现。这种现象经常出现于教育学者所作历史之中，正如高明士先生所说：“民国以来，治教育史者绝大部分是教育学者，历史学者并不多，——诚为美中之不足”。^[6]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的研究对此种不足有所补正。

日本学者研究汉代教育制度的成果，目前我们见到的有：市村讚次郎的《后汉的经学及选举与士风的关系》^[7]；牧野巽的《关于汉代教育的一二个问题》^[8]；镰田重雄的《汉代的门生、故吏》、《汉代的儒术和经术》、《后汉的处士》^[9]；宇都宫清雷的《关于管子弟子职篇》^[10]；远藤祐子《关于汉代地方官学的政治机能》^[11]等。对此问题研究最系统的当数东晋次，他在《东汉的政治与社会》一书中论述儒学的普及与知识阶层形成的关系时，涉及到汉代的教育制度。他首先对汉代学生的称谓予以考辨，否定了镰田重雄提出的诸生包括学者与学生的观点，指出汉代所谓的诸生是各类学校学生的总称，包括在太学学习的博士弟子、太学生，地方郡县学校的文学弟子、郡学生、诸郡生徒和私学的弟子、门生、门徒、门人等。并进而考察了学生的入学年龄，入学条件和社会待遇等问题。其次，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太学、郡国学、司学）和诸生的学业生活等三个方面系统的论述了汉代的教育制度。其研究深入而细致，为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学术史回顾之二——关于汉代教育制度的专题研究

教育史既是教育学领域的专门学问，也是历史学科的分支；教育制度作为汉代典章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对汉代教育制度进行的研究，除了前面所举的几位前辈学者所做的系统研究外，其他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通过不同的视角，对汉代教育制度的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们将一些热点问题述评如下。

1、关于太学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对汉代太学研究最为系统而全面的论文是毛礼锐的《汉代太学考略》。毛先生从汉代太学的创立和发展、博士官的设置和太学的教学以及太学生的学习、考试和政治活动等角度，对太学的设置时间、发展演变及其原因，博士制度及其在汉代的变化、学校的教学内容、学生的学习生活、升迁途径等都有所论述。其研究成果多为研究者采用，并且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线索。高慧斌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汉代太学考略》中，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太学问题的考辨更加深入而细致。作者从太学的创建和发展的一般状况、太学中的施教人员、太学生、太学与选举的关系、两汉国家对太学的管理以及太学的社会影响等六个方面，对太学创建的时间、地点、规模、博士的选拔、待遇、施教内容和施教方式、太学中学生的称号、太学生的选拔、待遇、入学年龄以及日常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并从宏观上阐明了太学与选举的关系，以及两汉国家对太学的管理，从而揭示出太学在汉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12]

在关于汉代太学的诸多问题中，讨论最为激烈的是太学创建的时间。这是研究汉代教育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创设博士弟子员制，标志着太学的建立。其论点为：（1）在此之前，汉政府并未直接设置学校，知识的传授和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私学中自发进行。汉初，有些博士官虽然也招收弟子进行教学活动，但这只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并非是朝廷赋予的职责，也未曾制度化，因此本质上仍属于私学性质。（2）汉武帝时期，社会的发展需要创建独立的官办大学，所以从董仲舒的对策，经过汉武帝下制讨论，到公孙弘等的奏议，其目的都在设置一个独立的太学，否则，他们就是多此一举的了。（3）史书的有关记载能够证明平帝以前有太学。^[13]

一种观点认为，平帝时王莽奏请为博士弟子建筑校舍才能算是太学创立，其代表人物是陈东原先生。^[14]理由是汉武帝所兴的太学即其所建的明堂，认为汉武帝时不仅没有独立设置太学，而且没有独立设置辟雍。有的研究者又加以补充，认为“刘向数奏封事，因说成帝兴辟雍设庠序而未得。盖自武帝置博士弟子员至此已有十余年，并无专门养士教育之所。当时所谓太学仅以武帝建立之明堂为代表。何武歌于太学下，此太学即武帝时所立之明堂，盖兼作辟雍会士之用，故有太学之称”。^[15]

还有一种观点甚至说，到东汉光武帝把太学和辟雍分立时，才算真正有了独立的太学。^[16]

第三种观点立论尚奇，证据不足，响应者少，影响不大，可作一家之言。前二种观点都言之有据，阵垒分明，争论文章时有发表。三种观点虽然分歧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将有没有独立的校舍作为汉代太学创建的重要标志。其实，古代学者已经围绕着西汉是否有独立的教学场所产生了分歧。晋朝尚书郎晋灼在其《汉书集注》中曾根据天子在曲台行射礼而下了“西京无太学”^[17]的论断，这是依据后汉多在太学行射礼，从而判断西汉没有独立的教学场所，进而不承认西汉有独立的太学教育机构，宋人洪适在《隶释》中继承了这种观点。^[18]唐人颜师古注解《汉

书》时认为“学官”指的就是“学校的馆舍”，^[19]此后，北宋程大昌、^[20]南宋王应麟、^[21]元朝马端临、^[22]清朝武亿^[23]等继承了这种观点，都认为西汉博士弟子设立之初即有馆舍，因而肯定西汉有独立的教育机构。总体来说，前二种观点不过是晋灼与颜师古见解的延展。这种讨论对于问题的解决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2、博士制度

博士制度是汉代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历代学者对此都很重视，特别是清朝乾嘉以来，出现了一系列考证秦汉博士制度的研究成果，如缪荃孙的《秦博士考》和《两汉经师得失论》、王鸣盛的《孟子汉置博士》和《立学》、臧林的《文帝始置博士》、杭世骏的《西汉立四经博士辩》、汪大均的《经传建立博士表》、蒋湘南的《经师家法考》、赵春沂的《汉经师家法考》以及胡秉虔的《汉西京博士考》、张金吾的《两汉五经博士考》等等。王国维的《汉魏博士考》是在清代诸学者研究基础上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王氏博学多识、治学严谨，其研究历史的视野宽、领域广，对教育史的研究也倾注了一定精力。1901年，他与史学大师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时，差不多每一期都刊发有他们及其他学者撰写的有关教育史、学术史论文。”^[24]王氏在《汉魏博士考》中对博士设置的时间、从秦朝到曹魏的演变过程、选拔与升迁办法、职责范围以及博士弟子员制度，都用丰富的材料予以精详的考订，对博士制度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作者专注于考证，没有阐述博士制度的演变原因及各方面的内在联系，因此，其“发明殊少”。^[25]

钱穆的《两汉博士家法考》采取历时性的研究手法，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了汉代的博士制度。关于博士制度创立的背景，钱氏认为：